



温州史学论丛

郑春生 尤育号 主编

(第三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温州史学论丛

郑春生 尤育号 主编

(第三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史学论丛. 第3辑/郑春生, 尤育号主编.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307-11992-5

I. ①温… II. ①郑… ②尤… III. ① 温州市—地方史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1747号

责任编辑: 郭倩 责任校对: 杨倩倩 封面设计: 祁睿一 版式设计: 浙江时代出版有限公司

策划: 大春文化 执行: 杭州沃尔德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3.25 字数: 414千字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1992-5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发行电话: 0571-88294389

序 言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与温州市历史学会主办的《温州史学论丛》第三辑出版之际,主编让我写个《前言》,恭敬不如从命,勉强为之。结合近几年的我校本学科办学过程,发现本辑《论丛》与前两辑相比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

入选论文 37 篇,数量较前两辑增加了,论文作者除个别老师外,主要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和部分本科生。

主编首次按内容分为四编,第一编是温州历史文化篇,10 篇文章;第二编是中国古代史篇,9 篇文章;第三编是中国近现代史篇,8 篇文章;第四编是世界史篇,10 篇文章。

温州历史文化研究属于地方史,是温州大学历史学科的研究强项,有“温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瓯越文化研究所”、“孙诒让研究所”、“温州华人华侨研究所”等研究机构,长期以来为服务温州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自 2006 年温州大学设置“专门史”学科硕士点以来,硕士生的研究方向大多与温州历史文化相关,学位论文研究温州历史文化的占 70% 以上。前两辑《论丛》地方史论文入选的都超过了 50%,所以主编都未对学科方向做分类。此次入选论文数量上少了,但如《同光年间温州士人的政治和文化取向——以黄体芳为考察对象》、《孙诒让职业教育观述论》、《林损:北大民国时期温州学派的中坚》、《试论南怀瑾的学术成就》、《温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17—1951)》等论文,对晚清民国时期的温籍知识分子与温州社会变迁予以考察,推进了近期较为热门的温州晚清民国史的研究。

2011 年国务院学位办对硕士点学科进行调整,温州大学的“专门史”学科点改名为“中国史”,升为一级学科。学科的研究方向更广了,学生的视野也更广了,选题也更为多样化了。除地方史外,涉及文献学、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革命史、经济史等领域与方向。本辑第二编、第三编所收入的《试论〈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的编纂与价值》、《汉代刺史职权的再认识》、《墓志铭所反映的北齐妇女与佛教问题初探——以上层妇女为中心》、《畿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汉代政治的影响》、《浅析魏晋时期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原因》、《清代甘肃士绅与

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孝庄与慈禧统治政策比较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述论》、《浅探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清末民初知识女性的崛起及其教育实践》、《翁文灏工业化思想特点》等论文就反映了这一变化。

2011年的学科调整,世界史被列为一级学科。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对这一变化很重视,加强了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引进和培养了多位年轻博士,现在在郑春生教授带领下学科团队已形成,学术成果丰硕。前面两辑《论丛》不收世界史论文,而本辑第四编收入10篇,占近四分之一,这是最明显的发展和变化。

通读全书,各篇论文的质量还参差不齐,一部分还显得较为稚嫩,一些论文的学术规范还得加强,但它客观地反映了温州大学历史学科当前的办学水平和学生的质量。为了温州大学历史专业和历史学科的更好发展,为了浙江、尤其是温州史学新人的更好成长,望读者诸君对书中错误严厉地批评,对不足大度地包容,对闪光之处不吝溢美之词。

蔡克骄

2013年8月10日

目 录

第一编 温州历史文化篇

同光年间温州士人的政治和文化取向

——以黄体芳为考察对象 尤育号(3)

孙诒让职业教育观述论 张方华 王兴文(15)

林损:北大民国时期温州学派的中坚 苏婷婷(23)

浅析周予同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 吴德平 郑春生(30)

试论南怀瑾的学术成就 符肖肖(37)

温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17—1951) 王 荣 尤育号(49)

温州新移民的出国与择业特征分析

——以“温州人走世界”栏目为中心 卜泽丹(67)

红军挺进师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原因分析 赵 琼(76)

古桥继承和保护现状研究

——以浙江瑞安地区为例 马 喆(86)

《申报》视野中的温州

——兼论其对温州地方史的价值 潘立川(99)

第二编 中国古代史篇

试论《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的编纂与价值 王苗苗(110)

对“永嘉言唐诗自潘怪起”的再分析 杜保钢(125)

汉代刺史职权的再认识 和兴旺(130)

墓志铭所反映的北齐妇女与佛教问题初探

——以上层妇女为中心 谭桂涛(138)

谶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吴妮妮(145)

浅析魏晋时期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原因	徐加新(154)
王阳明在南赣巡抚任上的教育实践初探	方晓青(160)
清代甘肃士绅与地方公益慈善事业	甘 慧(174)
孝庄与慈禧统治政策比较研究	郭 燕(182)

第三编 中国近现代史篇

简述晚清传教士建构的中国论说	李文梁(198)
陈立夫统一思想来源论析	沈 龔(206)
论近代不平等条约与传教保护 ——以美国为例	栾绍云(217)
中国共产党在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述论	周芳娟(227)
浅议任伯年的艺术创新精神	孙超男(238)
浅探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	顾欣欣(247)
清末民初知识女性的崛起及其教育实践	叶丽丽(253)
翁文灏工业化思想特点	陈 清(264)

第四编 世界史篇

试论加尔布雷特的社会批判思想	郑晓敏(274)
杜波依斯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钱 莹(285)
试论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环保运动	陈政伊(295)
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政治理论	田惠萍(302)
试论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	潘沉舒(310)
克林顿政府行政改革中的绩效评估及启示	王 坤(319)
论林肯的奴隶制政策和国家统一思想的离合	李燕灵(329)
“道”文化影响下的近代日本外交思想	尚明龙(336)
中世纪教会高利贷观念的嬗变	毛 吉(348)
浅论柏拉图灵魂观	刘雨倩(359)

第一编

温州历史文化篇



同光年间温州士人的政治和文化取向

——以黄体芳为考察对象^①

尤育号

摘要：晚清以来，由于以永嘉学术近代复兴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的振兴以及受到伴随着西力东渐而来的西学东渐的影响，温州地方崛起了一个颇具地域特色的士人群体，黄体芳即为其中的代表。面对亘古未遇的大变局，因时代条件和个人经历的局限，作为传统士人的黄体芳尽管在感受时代变迁的同时其自身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但基本立足点仍然是传统政治和文化资源。黄体芳既承袭了传统文化固有的“经世”、“自强”、“变通”等积极意识，力图顺应时势，有限度地吸纳西学；同时又以维护名教道统为己任，以“卫道者”自居，在传统的故道之上。可以说，这种面对变局的适应与反应不仅代表着黄体芳个人，同时也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批人。

关键词：黄体芳；清流；学政；温州士人

晚清以来，由于以永嘉学术近代复兴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的振兴以及受到伴随着西力东渐而来的西学东渐的影响，温州地方崛起了一个颇具地域特色的士人群体。其中，既有以经史旧学成就名于世，分别被誉为“晚清特立之儒”和“三百年绝等双”的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也有以维新思想与维新实践著于时被誉为“梨洲以后一天民”的宋恕和陈虬、陈黻宸等；既有宦游外地，在晚清政坛颇具时望的孙锵鸣、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徐定超等，也有植根区域社会，在新的知识空间中践履士绅角色的项湘藻、项崧、洪炳文、金晦、池志澂、刘绍宽、黄庆澄、张桐等。在学术、文化、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他们在“坐言”和“起行”方面都光大了七百年前永嘉前贤的经世传统，推动了区域社会与文化的近代转型。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与观念世界也因其所处时代的过渡性而呈现出多元多分歧和新旧杂糅的“过渡相”。

黄体芳(1832—1899年)，浙江瑞安人，字漱兰，号循引、莼隐，别署瘦楠，晚

^①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3NDJC103YB)、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2WSK027)研究成果。

号东瓯憨山老人,人称瑞安先生。出生于浙南瑞安一个下层士绅家庭的他,以同治二年会元的身份入选翰林院,在此后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曾两放试差,三任学政,累官至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作为同光清流的一员健将,他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等并称“翰林四谏”,颇负盛名,在维新时期还曾列名康有为创办的上海强学会。《清史稿》和《浙江通志》都曾为其立传。不可否认,黄体芳无论在仕宦方面还是文化上皆非那个时代的顶尖人物,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其个人的经历仍然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晚清以来,随着温州的开埠、永嘉事功之学的复兴,温州的区域经济与文化较之前,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以孙氏、黄氏为代表的颇具全国性影响的文化世家的崛起,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本身也是区域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从鸦片战争后的同治中兴到边疆危机、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再到戊戌维新,黄体芳或耳闻目睹、或亲身参与了晚清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晚清温州士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反应与适应以及他们的政治和文化价值取向。

一、家世与早岁经历

据记载,黄体芳的先祖为避唐末王审知之乱,由福建长溪赤岸徙居瑞邑湖岙,为瑞安黄氏之始。传八世至黄凤,字舜仪,号梧斋,为陈留县尹,于北宋崇宁(1102—1106年)间迁居邑东清泉乡白岩里,遂著籍称白岩黄氏。清康熙间,黄凤的二十二世孙仕彬(号礼斋),始从邑东白岩里徙居城厢小沙堤,实为黄氏家族史上一次颇为重要的转折,黄家从此由乡居转为城居,黄仕彬则因为考中生员而进入下层绅士的行列。瑞安黄氏在黄体芳之前,青史无名,但自五世祖黄仕彬以下,累世多有不同层次的学品。^①黄氏后人中曾任中科院首任秘书长的黄宗甄曾回忆说,黄家“世居城镇小沙巷,该巷旧名振文坊,振文坊口有‘比户书声’的匾额,以寒窗苦读而闻名。”^②因此,称瑞安黄氏以儒学世家可能言过其实,但有着崇尚读书的传统,当属毋庸置疑。

黄仕彬传三世到黄象清(1769—1820年,字韶音,号成九),即黄体芳的祖父。黄象清共有三子,次子名吉人,即黄体芳的父亲。黄吉人(1787—1844年),字履祥,号梧阳,娶同邑吴氏,共有三子一女,长子名体正(1810—1849年,字菊

^① 据《白岩黄氏宗谱》记载,黄体芳的高祖黄诏及其次子其渊、四子闲分别为监生、邑庠生、国学生;祖父象清则为郡廪生;父亲吉人、叔父达人、品人分别为岁贡生、邑增生和邑庠生。该谱系民国年间所修,具体年份不详,藏瑞安市图书馆。

^② 黄宗甄.瑞安五黄先生,瑞安文史资料(第四辑).瑞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1.

渔,道光十四年举人),次子名体立(1830—1875年,字苜蓿,咸丰六年进士),黄体芳则为三子。有关黄父的资料严重缺失,但从他中年以后“以经教授乡里”^①的记载中,我们隐约可以推测其作为传统社会中常见的普通文人的形象。生长在下层绅士家庭的黄吉人,继承了家族“尚读书、求仕进”的传统,但他的科举道路步履维艰,始终未能取得更高的功名,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十三岁时才援例选为岁贡^②,不过,这已是黄家数代以来的最高功名了。与几世先辈一样,只得了一个岁贡的黄吉人自然对更高一级的功名铭记于怀,可他只有寄希望于后辈发扬家风,光耀门楣。因此,黄吉人非常重视后辈的教育,不仅为黄体芳兄弟聘请了当时当地最好的老师,^③而且还亲自授学,督课甚严。下面这则邑人的日记,或许可以从中窥见乃父的言传身教对黄氏兄弟的影响:“黄吉人子体正,才质不甚聪敏,赖其父殷勤督课,学乃得成。”^④

与许多传统士子一样,黄体芳走的是一条由科举正途入仕的道路,读书、考试构成了他早年的生活。黄体芳出生的时代,清王朝已江河日下,“康乾盛世”早已不在,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更使得“天朝”困穷之家每况愈下。不过,地处浙南沿海的瑞安由于没有受到这场战争的直接冲击,邑内士绅家庭的日常生活秩序特别是子弟的教育问题并没有遭到很大破坏,出身于下层士绅家庭的黄体芳,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

黄体芳早年的教育主要得自父兄,父亲黄吉人曾“以经教授乡里”,而年长22岁的长兄黄体正早在他两岁时便“已膺乡荐,能导诸昆。”^⑤对于长兄的教诲,黄体芳《六十述怀》诗注有云:“少与仲兄苜蓿,师事伯兄菊渔。”^⑥除父兄的言传身教外,他还师从同邑孙衣言而受其影响颇深,曾说:“体芳自弱冠从吾师游,每侍坐,辄闻吾师称南宋乡先生之学以教学者,有所论著,必三致焉。”^⑦

父兄的督责和名师的指点,加之自身的勤奋知学,黄体芳的学业进步很快,这一点可从他六七岁时便经常被县令梁元(字一峰)招入县斋谈艺^⑧和儿时课艺甚获同邑举人曹应枢(字秋槎)嘉赏^⑨的记载中得到例证。然而,正当黄体芳在

① 孙延钊,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孙延钊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224.

② 孙延钊,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孙延钊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226.

③ 黄体芳会试朱卷所载受业师为:沈洺澜、许大培、金煜、黄济清、杨树东、陈福畴、蒋炳恩等,虽非知名学者,但俱为邑中名儒。见俞天舒:《黄体芳先生年谱》,《黄体芳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387页.

④ 孙延钊,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孙延钊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224.

⑤ 俞天舒,黄体芳集,369.

⑥ 俞天舒,黄体芳集,291.

⑦ 俞天舒,黄体芳集,176.

⑧ 孙衣言,逊学斋文钞(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5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4.

⑨ 俞天舒,黄体芳先生年谱,黄体芳集,385.

父兄师长的呵护与赞誉中奋力苦读时,却经历了人生的大不幸,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父亲去世,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长兄黄体正卒于京师。12岁丧父,17岁又失去了“不愧为兄师”的长兄,黄体芳的身心遭受重创无须多言,其晚年曾有诗云:“丧父勺龄胡太酷,别兄琴次亦堪哀。”^①不过,从其兄去世当年即赴省城应试及途中所吟“不须会看桃花色,此去蟾宫有桂花”^②的诗句推测,黄体芳似乎很快从家庭变故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求仕进以光宗耀祖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这一年,黄体芳在省城先后参加了是届“优贡”考试和乡试,虽然乡试落第,但在优贡考试中取得“备选优贡”的科名,并得以于翌年进入诂经精舍肄业^③。咸丰元年(1851年),即入诂经精舍的第二年,黄体芳便考中浙江乡试第八十九名举人,同时中举的还有二兄黄体立。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设馆授徒^④和争取更高的功名成了黄体芳的主要生活内容。咸丰二年(1852年)和六年(1856年),他两次赴京师应礼部试,皆不举,同治二年(1863年)第三次他赴京应试,中是科会元,旋以殿试二甲第十名的成绩选翰林院庶吉士,由此步入仕途。

二、清流要角:“引儒学之大义,争天下之是非”

在同治末,光绪初的晚清政坛,活跃着一群颇为引人注目的被称为“清流”的士大夫,其成员主要有黄体芳、张之洞、张佩纶、宝廷、吴大澂、邓承修、何金寿等。^⑤这些虽有学识但不当权的文学侍臣和言官,凭借“引儒学之大义,争天下之是非”^⑥的“清议”活动,成为同光政坛风云一时的一股政治力量。黄体芳几乎参与了同光清流的所有清议活动,甚至在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或遭遣戍或遭降级,同光清流渐趋瓦解的中法战争之后,仍然屡屡上书言事,“清誉至三十年弗少衰。”^⑦而有关同光清流的传言,无论是“松筠十君子”说,还是“四大金刚”说、

① 俞天舒. 黄体芳集. 291.

② 俞天舒. 黄体芳集. 308.

③ 黄体芳《补勤诗存序》载:“予与补勤同受知于吴崧甫、赵蓉舫两先生,肄业西湖诂经精舍,久以文字相期许”。见俞天舒编:《黄体芳集》,第148页。

④ 黄体芳与兄体立曾掌教本邑玉尺书院。见胡珠生:《温州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黄氏还曾设馆邻县平阳,其《温忠靖王传略书后》有“馆横阳杨氏……又得王之裔和钧、和鏊两茂才及徐门”之语。见俞天舒编《黄体芳集》,第157页。

⑤ 晚清的清流有南北、前后之分,本文所及仅指同光清流(前清流)。关于同光清流的成员,参见陈勇勤:《清流党成员问题考议》,《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第247-252页。

⑥ 杨国强. 晚清的清流与名士. 晚清的士人与士相.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54.

⑦ 费行简.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152-153.

“翰林四谏”说,^①尽管说法不同,黄体芳却总在其中,因此,他虽不是同光清流的挂帅人物,却是其中的一员要角。

黄体芳之所以加入清流行列,与个人的教养和经历密切相关。他自幼饱读儒家经典,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对功名怀有强烈的追求。在他的青年时代还经历了一次“金钱会”民变。咸丰十一年(1861年),“瑞安金钱寇起,体芳治乡团,以忠义激励人心,登陴坚守,誓与城共存亡,卒赖以固。”^②事后,他曾撰有《钱虏爱书》,以日记体的形式详细记载了这次由赵起等人领导的民变。^③这种经历使他对吏治败坏和民众疾苦有切身的体验。入仕以后,黄体芳在京则官翰詹,外放则充试差、点学政,词臣和学官生涯几乎贯穿其整个仕履。他于同治二年(1863年)中癸亥科进士后即长期供职于翰林院、詹事府,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侍读学士和詹事府左庶子、少詹事、詹事等职,其间又两放试差、三任学差。饱读经纶、由科举正途入仕的经历以及长期的词臣与学官生活,提升了他恪守儒家纲常名教、竭力维护道统的政治思想,也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同朝廷中的清流人物交游,^④并对吏治民生等现实问题有更多的了解,这一切都为他跻身清流奠定了基础。光绪二年(1876年),黄体芳自山东学政任满还京,再次出任詹事府左庶子这个冷差,国势日衰和个人官运的蹇滞,使他心怀郁结。恰在此时,京师名士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国子监司业宝廷、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张之洞等人掀起了上书言事的高潮,促使深感同调的黄体芳加入了这一行列。

对黄体芳来讲,清流生涯的影响是终生的,其中最大的影响莫过于政治声望的获取和品格的塑造。左宗棠曾称他“夙负文名,一时人望攸归”,^⑤孙家鼐谓其“立朝惟正色,常留谏草炳千秋”,^⑥王仁堪则将他与北宋司马光相提并论:“苏

① “松筠十君子”系指黄体芳、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陈宝琛、李端棻、张楷、邓庆麟、邓承修和邵懿辰。见《郭嵩焘日记》(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208页。“四大金刚”系指黄体芳、张佩纶、陈宝琛、宝廷。见刘声木:《莼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03页。而“翰林四谏”通常指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张之洞。《清史稿》卷四四四曰:“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但也有不同说法,如黄潜一度认为“四谏”指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并不包括黄体芳,后又认为“说本不一,不必定指何人”。见《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7页,第129页。陈宝琛则以黄体芳、张佩纶、宝廷和何金寿为“四谏”。见《沧趣楼诗集》卷七,第6页。张之洞《寿黄漱兰通政六十》则有“后雕独有贞松在,四谏荣名冠翰林”之句。见《黄体芳集》,第371页。考之《清史稿》和当事人的记述,黄体芳应在“翰林四谏”之列。

② 俞天舒。黄体芳集,358。

③ 马允伦。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90-123。

④ 关于黄体芳与清流士大夫的交游,参见尤育号:《黄体芳社会交游考察》,《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72-77页。

⑤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⑥ 俞天舒。黄体芳集,374。

氏子瞻之论温公之德行也,曰诚曰一,今吾党所寿吾师者,亦曰诚曰一而已。”^①近人费行简还将他与同为清流的陈宝琛、张佩纶作比较,称他“立朝日频上书言时政得失,亦侃侃不挠,时与张佩纶、陈宝琛等主持清议,而体芳诚笃忠挺,表里若一,佩纶、宝琛皆惊声华,不足拟也。”^②从这些言论不难看出,黄体芳作为同光两朝的直臣在官场和士林获得良好的政治声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任鄂臬的梁鼎芬入京进觐,奏请朝廷表彰已故直言诸臣12人以“扶持正气”,首列者即为黄体芳,^③也是一有力证明。清流生涯不仅使黄体芳获得了敢言直谏“直声震中外”的名声,对他个人品格的形成也有着重要影响。“清流”主要相对于“浊流”,清流士大夫揭露与抨击的主要是社会现实的阴暗面,这就要求他们无论个人生活还是政治行为都得严于律己,否则,就有可能授人以柄而有损自己“清”的形象。史书记载黄体芳“通籍三十年无馀财,无一椽之庇”,^④“致仕归家,无寸田足自给”,^⑤从侧面证明了他守身廉洁,而前述的种种称颂,与他的自律自重、刚正廉洁的品格也密切相关。

然而,黄体芳以清议名于时,也因为清议而背于时。当权力争斗调节器的作用逐渐消失时,清流的失势在所难免。中法战争后,随着张佩纶被发配军台效力赎罪,陈宝琛因“保荐失察”而遭降级处分,清流作为一个非正式的政治群体逐渐解散,而黄体芳却始终保持敢言直谏的清流本色。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刚从江苏学政任满还京的黄体芳“不识时务”地上奏朝廷,疏劾李鸿章治兵无效,请敕曾纪泽遄归练师以代李鸿章会办海军,换来“妄议更张,迹近乱政”的申斥和“降二级调用”的处分^⑥。然而,个人仕运遭受重大挫折的他此后在通政司通政使、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任内,仍然频频上疏,“奏言自强之本在内治,又历陈中外交涉得失”,^⑦敢言直谏的清流本色依然不改。究其原因,除个人性格方面的因素外,忠君卫道的思想立场以及对儒家所倡导的“内圣外王”之道和士大夫气节的孜孜追求,恐怕是主要原因。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于“屡疏皆不报”,深感“有言责者不得其言而去”^⑧的黄体芳不得不以病乞退并获准,最终在“学而优则仕,仕而忧则隐”的儒家哲学中走了个人生来回。

①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917.

②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153.

③ 鄂臬梁鼎芬奏请追录直臣折. 申报, 1907-1-19.

④ 俞天舒. 黄体芳集. 359.

⑤ 俞天舒. 黄体芳集. 362.

⑥ 俞天舒. 黄体芳集. 406-407.

⑦ 赵尔巽等. 清史稿(卷四四四). 北京:中华书局, 1977:12452.

⑧ 王孝绳. 王苏州遗书. 915.

三、督学鲁苏：“飭廉隅以端士习，严鉴别以核人文”

试差与学差的学官生涯是黄体芳近三十年仕履的重要内容。同治九年(1870年)，黄体芳在京做了几年翰林之后第一次得到实差，简放福建学政，后因丁母忧便于是年冬卸职归里。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又简放贵州乡试副考官，事毕即改任山东学政。光绪六年(1880年)，因前任学政夏同善卒于任上，黄体芳得以补授江苏学政，并于两年后连任。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还有一次福建乡试正考官的试差经历。

学政为清代主管一省教育事务的最高官员，照例由进士出身的翰林和部员出任，任期三年，“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率教者，凡有兴革，会督抚行之”^①，其地位与督抚平行。学政虽属差官性质，但可广结门生，而且所考之处，例有不菲的“棚费”和其他收入，因而被生活清苦的翰林视为求之不得的美差，“承平时，京官最称清苦，翰林翘首望差，阅三年得以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生用之不尽。”^②然而，“不为良相，则为良师”，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黄体芳，有着自己认定的理想事业和人文关怀：振兴士风，维护道统。他在出任江苏学政的《恭报到任日期折》中，即表露了以纪昀、阮元的功绩自期的心迹：

大江南北之区，夙称文薮，粤自昭代康雍而后，大饷儒风。纪昀纂书目之编，录四库者千九百卷；阮元上儒林之传，通诸经者二十余家。自顾颉思，曷堪模楷。臣惟有飭廉隅以端士习，严鉴别以核人文。^③

黄体芳在近十年的学官生涯中，努力为朝廷选拔优秀人才，得士颇盛。仅视学江苏期间汇刻的《江左校士录》，收录的名士就有吴县曹元弼、通州范当世和范钟、泰兴朱铭盘、上海姚文枬和张焕纶、太仓唐文治、金匱华世芳、娄县张锡恭、兴化赵兴传等人^④，张焕纶还因科举试卷深得激赏而被移檄促应拔贡考试。^⑤黄体芳还随时访求行谊纯笃、学问优长之士，奏请朝廷叙用，史载其“保荐左赞善、于荫霖之器识，山东知府全士铎之吏治、临海举人周郁雨之算学，后皆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一六），3345。

②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8。

③ 俞天舒，黄体芳集，21。

④ 俞天舒，黄体芳集，406。

⑤ 易惠莉，同光年间上海本邑绅士的生活价值取向——以张焕纶为主要考察对象（上），历史教学问题，2005（3）：11。

各有树立。”^①而他所延幕宾则有光绪九年进士后官监察御史的永嘉徐定超和编有《清季外交史料》的黄岩王彦威等人。

在黄体芳看来,学政之职不仅在于衡文校士,更在于“培士风,振儒术”,他说:“朝廷遣督学使者分巡各行省,非第以考校文艺、广多士进身之途而已,将以培士风、振儒术也。”^②因此,他始终致力于培养良好的士风士习。而创办江阴南菁书院,无疑是他培养人才、振兴士风的主要实践,恐怕也是他近十年学官生涯最值得一书的事功。关于南菁书院的源起,首任掌教张文虎在《南菁书院记》写道:

(江阴)旧有暨阳书院,余姚卢学士如弓、武进李大令申耆先后主讲席,流风馥韵,上下百年。……然寇乱以后,士族解散,兹虽规复,制艺以外,鲜治旧业。光绪七年,瑞安黄公来提督学政,喟然曰:“岂卢、李两先生之教泽止于斯乎?”既而科试一周,奉旨留任……曰:“士为四民首,教民自士始,教士自读书始,夫有士而不能教,官其地者之责也。上海仅一邑耳,而龙门书院独放浙江诂经精舍制,士得在院肄业经史、古学、天文、算法,惟所习盍亦谋之?”^③

鉴于学政的“教士”之职以及旧有书院“制艺以外,鲜治旧业”而致使其自由讲学论道传统的丧失,同时也因为在清流时期形成的振兴儒学的信念和对个人事功的追求,黄体芳于光绪八年(1882年)留任江苏学政后,遂捐廉为倡,效法阮元创建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之举,谋就学署驻节地江阴筹建书院,并集朱熹《子游词堂记》“南方之学,得其菁华”之句,名之曰“南菁书院”。

黄体芳创办南菁书院,旨在“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经学则性理附焉,古学则天文、算学、舆地、史论附焉”,^④这种课程安排充分体现了南菁书院汉宋兼习的学术取向和致用宗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体芳为“使来者不忘其初,而衿祀汉儒郑公及朱子于后堂,使各学其性之所近,而不限以一先生之言。”^⑤与阮元当年创办诂经精舍崇祀郑玄和许慎两位汉学大师不同,黄体芳却在南菁书院并祀郑玄和朱熹,在维护汉学正统的同时,推崇程朱理学。南菁书院虽是黄体芳效仿诂经精舍之制而创办,并同以专课经古著称,但它又以鲜明的“调和汉宋”的治学立场而有别于诂经精舍,这一点即反映了黄体芳和而不同的个性,同时也是晚清思想界反思汉学,回归宋学思想潮流的一个例证。

① 俞天舒,黄体芳集,359.

② 俞天舒,黄体芳集,40.

③ 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1):67.

④ 缪荃孙,江阴县续志(卷六),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70(5):361-362.

⑤ 黄体芳,南菁书院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24:73.